

传统音乐风采实录

民族文化遗产整理

调查与心得

中华音乐风采录

面向21世纪

文化复兴

主动选择

王镇华
修海林
文珍

主编

(京)新登字 172 号

中华音乐风采录

王镇华 修海林 李文珍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2插页

1994年8月第1版 199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册

ISBN 7-5059-1952-0

定价: 11.30元

J·550

我们为什么出版这本书（代序）

一

《中华音乐风采录——中国传统音乐采风与心得》出版之际，正值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行将走过 20 世纪、迈向 21 世纪文化新纪元之时。由于近百年来历史不断给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提供的机遇和条件，因此，在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转型过程中，怀着一种理想与努力编纂的这本文集，它的问世，便具有了新的意义。

可以说，这本《风采录》以及作为其先源的《中国传统音乐采风与心得》专栏（载《中国音乐》），从其产生之初，便凝聚着一种投入当代文化建设的自觉奉献精神；呈现出一种志在未来文化建设的主动选择精神。这是由参预这项工作的所有作者和编者的共同努力体现出来的。尽管这些努力与“经济效益”相去甚远，但是善于体察时代文化脉搏的人士又不能不看到，面向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作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已经从表层行为与深层心理上发生着显见的变化，即逐渐认同这样一种文化观：经过自世纪初至今近百年中西文化的交融、互补，中国文化新的建设方向的再度选

择，应是在发掘、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和学习一切人类优秀文化成果，进行新的文化创造。有识之士皆寄希望于中国文化的再度“复兴”。

出于这样一种现实中的理想与厚望，我们在本书作者群体的通力合作、支持下，克服困难，催生了这一新生婴儿——《中国音乐风采录——中国传统音乐采风与心得》。书中所收各类传统音乐调查报告与学习、研究和体验中产生的种种心得，均产生于长期涉足于民族音乐生活的调查访录中；产生于对传统音乐几十年含辛茹苦的收集、研究以及思考中；产生于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事业发展的执着追求中；产生于对具活泼生动形态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沉浸、品味乃至“顿悟”的心灵感受中……这其中，无论是感性的体验、知性的判断以及理性的思考，甚或所有这些心灵现象的综合，均来自于对传统音乐文化在形态、观念、行为诸方面的深切体悟。由这种体悟而产生的真切感受，除了体现在对民族音乐诸文化事项以深入持久的调查，并给以实证性的描述之外，同时也经常以“心得”、感悟的方式，对传统音乐的深层心理与文化内核予以揭示。

心得代表了一种实践和创造。心得是文化实践者和创造者的心得，是一种直接的体验，它能影响实践、复活传统文化，激发出生气，保存和发展传统优秀文化的“慧根”，使之在今天得到延承，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心得代表了一种智慧。它具有越来越显见的启示作用。这种智慧不是单纯知识的积累，而是在熟悉并运用知识，在认识对象中产生的深刻“见识”或感悟。这种从内心产生可称得上为真知灼见的“见识”，同狭隘的职业自尊或价值取

向没有必然关系，而是一种可以鼓舞今人，启迪后学者并能终身受益的精神财富。这类“心得”（“见识”）产生的能量，将为民族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种“见识”，必来之于对自身文化发展方向特别的明确而矢志不移的认识。

心得也是一种理想。尽管理想往往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但是，从人类进步文化发展总的趋势来看，没有或者提不出自己民族文化建设的理想，便不可能开拓出对未来的巨大展望，从而失去必要的动力。只有立足于理想的精神动力与现实的实践努力两端之间“允执厥中”，才能使现实成为理想的现实，从而获得文化的健康发展。

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在发展中因在过于极端的反传统时流影响下而曾经有过选择中的偏颇或失误，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对文化继承中创新的问题给予深入的思考和足够的支持。文化继承不得其传承创新者，必然导致从根子上产生偏误；文化继承得其传承创新者，则成为文化不失其自身品格健康发展的基础。显见的问题是，丧失了自身的文化根基，最终也必然丧失自身的“国际性”与“世界意义”。

若本书能够成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通向 21 世纪道路中众多道标之一，则是全书作者与编者的莫大荣幸！

二

本书之缘起，始于《中国传统音乐采风与心得》专栏的创办。1988 年夏，台湾文化学者王镇华教授赴西安参加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并作《中国艺术特质》的演讲。会上，他为长期从事传统音乐文化工作的代表们所作发言及

成果而感动，认为“让我们真有体会的人把心得留下来”很有必要。因此，他在归台前委托李文珍或以出书、或以杂志增刊、或以杂志专栏的形式创办《中国传统音乐采风与心得》，并愿意资助这件事。后经多种尝试和努力，最后在《中国音乐》薛良先生的支持下，由王镇华、修海林、李文珍主编《中国传统音乐采风与心得》专栏，于1990年创办，至今已陆续刊载7期45篇文章，在海峡两岸音乐界、文化界均引起关注和反响。

在办专栏期间，王镇华先生辞去中原大学建筑系教职，以“准备喝稀粥”的精神于民间创办德简书院，从事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创新工作，虽积劳成疾、经费短缺，对专栏支持始终不渝、竭尽全力。在此献身精神感染下，台湾音乐家胡金山等亦为专栏提供过资助。目前，专栏将在《中国音乐》主办者的支持下继续办下去，借此机会，我们代表作者、编者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由于王镇华先生的资助，《中华音乐风采录》终于出版了。这本文集的所有撰稿（赐稿）者，在无稿酬的前提下，均给以热忱相助，编纂工作由组稿至绘谱亦均属无偿劳动，这在社会上“仰富趋利”风气甚重的大环境中，体现的正是一种“厚道”的优秀传统人文精神。在这里，我们谨向所有撰稿（赐稿）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三

自1990年在《中国音乐》上开辟《中国传统音乐采风与心得》专栏起，我们得到了众多为专栏积极撰稿的作者的支持。在编纂这本《风采录》时，所有的作者皆提供了热情的

支持，有的作者从编选内容、选材角度等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并特地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调查报告与心得。还有的作者将自己最新的成果提供给本书以示支持，这些皆使得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民族音乐教学、研究的“示范本”来使用。在这里我们向这些作者表示真诚的谢意。

编纂这本《风采录》之初，因其缘起，我们就考虑以专栏上已发表的文章为主体而编辑成集。由于经费有限而导致字数容量的减少，而一些篇幅较长又确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采风调查报告因字数太长在刊物上难以全文发表，一些新的调查报告与心得也有待早日问世，因此，考虑到本书在某种意义上讲实为专栏的延续，已发表的文章（不含台湾学者文章）便不再录用。同时，为了使刊物与本书的采风调查与心得成为一个整体，本书特设刊物专栏已发文章之“文目”，使读者便于查找，所谓“见‘目’如见‘文’。”

因限于篇幅，本书录用文章，有不少篇在内容与谱例引证方面作有删节或选录。录用文章均在文后注明原出处与原字数，以便读者查阅所用。在此谨向为编纂提供文章删选方便的诸位先生深表谢忱。

本书的最大遗憾，在于未能将不少有相当积累与成就同仁的文章都容纳进来，这固然有时间的短促、篇幅的有限等诸多客观原因。作为编者，我们将竭力争取该书续集的编纂出版而弥补此缺憾，这里同样需要同仁的理解与支持。

本书的文目排列虽无统一的分类标准，但大致上尚能反映编者分类归属的意图，其中包括各类“心得”（既包括长期从事民族音乐工作的各种理论思考与方法的总结，也包括对某一类音乐文化现象的感悟等）、多声部民歌调查与研究、

按不同地区分类归属的采风调查报告与心得等。我们还特别选用了从传统音乐的历史与遗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论文章与实地调查研究成果。在文章的选用中，我们对一些长期在基层从事民族音乐采集调查工作同志的文章给予一定的“倾斜”，这也是提倡和鼓励能有更多的这类成果问世、能有更多的同仁能足踏实地进行这类“田野工作”的一种“价值取向”。

对于本书与专栏编纂工作中的不当之处，恳请读者、作者提出批评和建议，以利于今后工作的进一步改进。

修海林 李文珍

1993年12月20日于北京

《中国传统音乐采风与心得》

专栏编者寄语

(台湾) 王镇华

专栏文章的性质，我本想是科学客观的调查记录，难以兼顾主观心得。然而心得往往是穿透整个文化的抽象部分，我是希望能鼓励这样的东西出来，愿意它是跟客观报告一起，只是分别处理而已。因此，完整的调查报告我们应刊登，当然长期积淀的心得更是结晶。

这件事，要持续做下去，才会慢慢带起一点风气。总之，客观的调查记录，要；主观的心得体会，更需要。

《德简》书信

(台湾) 王镇华

一、为什么离开大学办书院

为什么要办德简书院，是说不完的。

书院的开场白，我是以一项活动替代酒会或记者会——对好友们把《易经》讲一遍，然后大家讨论。这活动要持续卅几周，现正好进行到复卦，“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还给中国文化复的机会！我心也相信不移。记得当时我在卡片上写了三条：

(1) 在今天的教育体制外，打开一扇窗户，

(2) 以民间教育的方式，延续中国文化。

(3) 有余力时，为海峡两岸的公共事务注入“成长”的意见，以免经济、政治、社会等活动只是力量的倾轧。

去年底，在新儒家的国际会议综合讨论上，感触很大，正如新贴春联所写“儒门淡薄收拾不住，汉家文化终难自弃”，笔记上感想也有三条：

(1) 中国文化的基调在主体成长的实践；当实践滑落到概念的思辨，也就是概念浮离了实践，我闻到言语中少了

固有的一种实感与谦虚。

(2) 主体成长是属于自我完成的人格问题，科学民主所获致的经济政治上的自由是属于人权问题，两者虽有关，但层次不同，有了人权的基本自由，不知如何达到人格成熟的主体自由，即是两者的分际。人权是人生存之必要条件，但人格毕竟是人权之所自与所归。我以为百年来中国最大的悲剧与痛苦，即来自于这种层次的错乱。吴大猷先生认为台湾的经济成就与儒家绝无关系，乃至立法院、委员们为了争取人权竟侮辱别人的人格，不都是眼前活生生的例子，新儒家综合讨论的主题“新儒学与中国的现代化”，却又失之过份强调两者的关系。

(3) 有人感于社会风气败坏，而要新儒家更积极的切近社会现实。我觉得儒家的当下实践，自己做人，对周遭自有一种影响力。目前社会不正缺乏自主自知的独立人，以及由这样的人做出真正多元的事？所谓无形的比有形的还重要。忠于自己之实践，连最遥远的梦，都会动起来。何况周遭现实！？

这三条也可以说是德简的基本精神：(1) 言论不浮离实践，至少言要顾行。(2) 传统做人的种种原则，仍是人权的基础与归向，不需互相拒斥。(3) 自己真在做人，对别人自有真切影响，媒体时代尤然。

(原文载《德简书院》试刊号，1991年，台北。)

二、原典班：新开《论语》

四月底接着《老子》班要开的《论语》班，是我最想开

的原典课。我知道社会对它的成见很深，以为“都读过了”，“时代不同老书没用了”。部分重开《论语》的理由，上文“人格与人权”已讨论；面对好的中国文化难的不在直接的接触、有感，而在腐品或成见，我们该大破大立，移开挡在我们与原典之间的“标准答案”，直接与那个人谈谈了，我跟孔老夫子（《论语》）深谈多次体会是：

（1）在孔庙吃冷猪肉的不是孔子，是被专制利用的孔家店。孔子本人是生龙活虎，不失幽默，学生敢当面糗他的一位好老师。

（2）《论语》是最活的一本书，一本没有预计出版的生活语录，我们只是找不到切入的点，一旦找到而能领会，生活中几乎都用得上，它正是脱序社会个人的定海针，人际的社会规范。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人毫无侵犯，现在的“己所欲施于人”，可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它最没教条气，反而是几千年来用的人，“方巾气”太重（即把《论语》当万灵丹，依赖、拘谨、不活脱，还矜持高姿态）。

（3）《论语》看似没有一个系统，一条一条的，我却读出一个奇特的经验：它能帮你构筑你自己的生活体系。认知上很有系统的书，不见得能照顾到生活种种体会、问题：一段一段的论语，背后似乎有一个无形的活体系，你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往上搁（其实即你以自己体会去解释），慢慢反而会生出一个自己的体系。

（4）我最感动而觉得难得的是：《论语》中有种活活泼泼的“情境”。教育难的不是“知识”，而是“情境”，情境有知识、概念难以掌握与传递的成分，《论语》正活活的捕捉了那份生动。实践的功力流露于情境，而情境才能打动

我们实践的心。

(5) 我常说日本人喜读《庄子》，欧洲人爱读《老子》(卅几国文字，百多种译本)，《论语》是留给中国人读的，甚至不怎么读，在生活中默契待行的。现在可不一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为培植“见树亦见林”的博士，认为敦请大学者带博士生读世界原典，是当务之急，因原典才碰得到一个文化的整体性与复杂性，才碰得到文化的底层深处。人类哲思的衰竭、社会的庸俗化、媒体的空乏，中西皆然，都与不读原典有关。委员会对中国部分选的原典，即《论语》与《庄子》。真是“你丢我捡”，你僵疲我新鲜。

《论语》的用字平实，正如他老人家自己说的“辞达而已矣！”，所以不用解释太多，倒是你到底体会到什么，也许人人不同；我打算采取雷台法上课——有感就发，唯真是从。当然，基本上我会准备我最感动的体会或我自己的体会。

(原文载《德简书院》试刊号，1991年，台北。6千字)

三、文化是什么？

平和安逸的生活中，学点英文、音乐等，增加自己的能力与艺术修养，这固然好，但生活出了问题，英文、音乐的帮助很有限——一个人的成长显然有更活生生的、有泪有笑的课题，这些不外乎做人做事的种种（即人格的成长）。疏忽了生活里最平实的这一面，在个人，时常会被无名的情绪、无聊、封闭所困；在社会，有时更呈现出人类野性冲突的冷

酷与悲惨。所谓文化，即以“文”化民为人，使人群尽量减少弱肉强食的恐惧，而过一种和谐上进的生活。这个“文”，当然不是会写文章、文文气气的文，在春秋以前，“文”特指六经等古代典籍，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这是我们先民长期生活实践中，凝练出来的经验记录。我们不必把“经”想得很深奥难懂，“经”只是古人对那几本古书的尊称；六经可贵的地方，正在于它们的成熟通达，易知易行，它告诉我们一个人如何安身立命，一个社会如何和谐上进。困难在于“如何了解商周时代的用字”，“如何以你自己的经验去体会它”，这是可以克服的。

文化，是如何做一个人的问题，是如何过一种人的生活的问题。

经济、政治的进展，并不一定能带来这种文化安排下的有意义的生活；经济政治是基础，并非本题。有文化的生活，即老话所谓“像个人的生活”，至少人际之间彼此尊重，竞争有道。有道不只是有法令，那照样可以“民免（不犯法）而无耻”，譬如做生意，别人不犯法照样可以气死你；抽去了做人的问题，做事就失去意义，有道是指做人到做事有完整的一套，不能只管做事不管做人，不能只管社会的效率、控制，不管个人的充实、尊严。偏废了人际关系、人的尊严等，这样的生活还“像个人的生活”吗？现在的社会到底如何，你看看商店买卖的态度，看看一般职业做事的心情；社会并不因为经济政治有进展，民情风俗就敦厚起来。

固然，社会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问题，但现阶段，显然“饱暖思淫欲”、“庶之富之而后教之”的问题更大。

人情的淡薄、职业的倦怠、心理异常对社会的危害、青少年的苦闷、暴力问题、果菜上的农药、以及各种怪力乱神的泛滥……这些个人的、社会的现象，都是文化长期被疏忽凸显出来的。

（摘自《“儿童文化班”的缘起与构想》，原文载《德简书院》试刊号，1991年台北。4千字。）

附：〈中国艺术的特质〉（演讲摘要）

我觉得中国最悲惨的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忠于认知委屈心灵。我们一直要用有意识的思考去认识这个东西，但是思考会变得非常复杂。我不是说不要思考，思考是一辈子的。你在短时间内用思考去认识那个东西是很难的。后果是心灵搁一边，认识永远是一点点。一辈子下来内心真的有一点体会，但不敢讲，不敢相信那个体会就是真正你对艺术的了解。说穿了，中国艺术就是要体会嘛，你的体会不讲你讲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位朋友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漆器，台大毕业，艺术研究院毕业。他每次见到我就说“我总有个感慨。”他每次写漆器论文写得很开心，但是马上会发现，他要把心得拿掉而将论文推出去。因为那个心得的证明不够充分，科学要有充分证明的嘛！这样带来两个现象：一是论文推出去以后，他发现每一篇论文只有让他的值等增加，他要升等就要靠论文，但是跟他这个人没什么关系；二是心得拿掉后他觉得心得还是蛮重要的，但是生活通通在写论文，永远没有时间整理他的心得。他每次看见我就“觉得你老是跟我谈心得”。我说“我也不知道哇，你会有这个感

觉我倒觉得蛮好的”。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悲哀啊！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一道把心得写下来。尤其是办杂志报纸，不要光去写论文，也让真有体会的人把心得留下来。不要什么充分的证明，我一辈子都在听这么嘛。我不是说不要证明，科学的论文还是要写，但是那是一种价值，写心得是另外一种价值，两个不要矛盾。体会一拿下来，都是在认知。凭良心讲，我们的知识不足以充分了解中国文化。台湾这么多热爱中国文化的都走回头路了，都是西方艺术走得真正到家了，回过头来才知道中国文化了不起。为什么一定要冲突呢？写论文就好好去写嘛，不要在学术上夺权嘛，学术上夺权就是一定要写论文，这个才叫做文章，那个就不叫了。最妙的就是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艺术，研究完了连产生中国艺术的方法都不承认了，中国有用科学方法来论艺术的吗？我们都是实践嘛，心得嘛。用西方科学论文的标准来看中国的艺术，一篇论文也没有哇。我每次讲到这里就很痛心，至少应该中西的学术方法并重。我们不要用一个来排斥一个。

（1988年在苏州文艺界演讲）

“中国传统音乐采风
与心得”专栏

前 言

黄翔鹏

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现象都是历史地形成着的。传统音乐之所以成其为传统音乐，就更不待言了。巴托克也好、高尔基也好，都从他们本人的实际体验中说过“民歌就是人民的活的历史”这种可发学人深思的断语。那么，我们应当像历史家研究历史那样去研究传统音乐吗？

“钻故纸堆”当然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但如只用这一种手段时，恐怕就是舍本逐末了。有许多号称史家、理论家的学者，大概早已忘掉了太史公司马迁曾经怎样研究历史。太史公在读万卷书的同时，是还要行万里路的，是要力戒“浅见寡闻”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承敝通变”、“拾遗补阙”的。（引文均见《史记》）

到人民生活中去，从实践活动的调查，这实在是司马迁力求“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前提条件。用音乐民族学的术语说，这叫做“田野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讲，这是以生活为源泉的观点与精神之体现。可惜除掉很多身在基